

教研参考

第9、10期（总第291、292期）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日

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学科 文摘选辑 (1986)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图书馆编

D239 / 3

说 明

607-7614-04

本刊一九八六年编辑了《哲学社会科学文摘选辑》共四册，即《哲学部分》、《经济学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党的建设部分》和《中共党史部分、中国近代史部分》，选辑了十二大至一九八五年的有关材料。今年又编辑了《哲学学科文摘选辑》、《经济学学科文摘选辑》、《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学科文摘选辑》、《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学科文摘选辑》和《抗日战争专题研究文摘选辑》，前四册标题后面括号内均注明1986字样，表明所选内容以一九八六年有关材料为主。每册所选材料都做了简明的分类，目录与正文前分别冠以相应的顺序号，以便于检索。今年和去年所选的两套文摘，内容有一定的连续性，又独立成册。今年的文摘选辑，由靳殿良同志统稿。

本册《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学科文摘选辑》的中共党史部分、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由张经纬同志选编，中国近代史的另一部分由舒燕同志选编。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图书馆

1987.4.

目 录

中 共 党 史

总论

- (1) 关于党史研究方法问题
- (2) 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体系问题
- (3) 中国革命史上下限新说
- (4) 怎样看待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
- (5) 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 (6)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问题
- (7) 中共组织史研究的现状
- (8) 中共组织史的定义与研究对象
- (9) 中共组织史与党史、党建学科的关系
- (10) 对党史教学中一种常用提法的商榷
- (11) 编写党史工具书应注意的问题
- (12) 港台与国外用新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 (13) 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国际一体化趋势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14) 党的创立阶段应否独立划为一个时期
- (15) 关于党创立时期的上限
- (16) 关于党创立时期的下限
- (17) 对党前四次代表大会研究取得的进展
- (18) 关于北伐战争后期主要矛盾的转化
- (19)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
- (20)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影响

- (21) 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

- (22) 大革命时期能否开展土地革命
- (23) 大革命的失败和共产国际的责任
- (24) 上海总商会的阶级属性及其评价
- (25) 关于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26) 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研究的新进展
- (27) 关于陕甘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新进展
- (28)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29) 关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 (30) 关于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 (31) 海陆丰根据地史研究中仍需探讨的两个问题
- (32) 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学术讨论会简介
- (33) 有关井冈山斗争两次曲折的责任问题
- (34)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 (35) 南昌起义是否开展了土地革命
- (36) 关于富田事变
- (37) 对“三湾改变”的新看法

收问题

- (38) 关于红军长征研究的几个问题
- (39) 红军确定长征立足点的四个因素
- (41) 胡华谈红军长征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 (42) 关于“一二九”运动研究的三个问题
- (43) 张闻天的转变是真诚的
- (44)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
- (45) 关于王明上台的原因问题
- (46) 西安事变研究的新进展
- (47)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些不同观点

抗日战争时期

- (48) 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 (49)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同中国的关系
- (50) 抗日战争史上限问题
- (51) 叶飞谈对编写新四军史料丛书的意见
- (52) “逼蒋抗日”不是统一战线的独立阶段
- (53) 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
- (54) 百团大战没有违背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
- (55) 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
- (56) 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57) 王首道谈中原突围的伟大意义
- (58) 关于联合政府方针的评价
- (59) 韩先楚谈辽沈战役胜利的原因
- (60) “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战役
- (61) 平津战役若干问题初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62) 反右倾是农业合作化加快的原因之一
- (63) 错误分析形势是农业合作化加快的原因之一
- (64) 合作化的加快与对个体经济的片面认识有关
- (65)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两次小白楼会议
- (66) 刘少奇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的形成
- (67) 关于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评价
- (68) 总路线是1956年反冒进的反命题
- (69) “高速度”是总路线的中心思想
- (70) 关于总路线的提出及其基本思想
- (71)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总路线的实践
- (72) 关于大跃进的提出和大跃进运动
- (73) 关于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公社化运动
- (74) 怎样评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75) 对“三面红旗”应当进行再认识
- (76) 旧经济体制模式是“文革”发生的经济根源
- (77)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 (78) 妨碍改革的主要障碍是封建残余影响
- (79) 杜润生认为我国不能叫“多种经济并存的社会”

中国近代史

总论

- (1) 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原因新说
- (2) 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

线

- (3) 中国近代军事史的分期
- (4)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三个环节
- (5) 旧民生主义不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 (6) 西学的输入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觉醒
- (7)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 (8) 中国近代买办资产阶级概念界说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

- (9) 道光帝在禁烟运动中的作用
- (10) 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划分
- (11)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有关人物的评价
- (12) 关于林则徐思想体系的争论
- (13) 如何估价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 (14) 林则徐的重民思想
- (15) 英国人呤喇评太平天国的税制
- (16) 《天朝田亩制度》中均田思想的进步性和革命性
- (17) 《资政新篇》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 (18) 关于洪秀全的早期思想
- (19) 关于近年来韦昌辉评价综述

- (20) 分裂的帽子不应戴在石达开头上
- (21) 曾国藩值得认真研究

从洋务运动到义和团运动

- (22) 关于洋务思潮产生的历史原因
- (23) 为“洋务思潮”立名
- (24) 洋务官僚对新式企业起了阻挠作用
- (25) 洋务企业不是官僚资本
- (26) 洋务运动与外交
- (27) 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
- (28) 关于左宗棠的民族政策问题
- (29) 李鸿章主张排外而不是媚外
- (30) 《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其意义
- (31) 康有为提出设制度局的原因
- (32) 张之洞《劝学篇》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
- (33) 张之洞的商业思想具有两面性
- (34) 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综述
- (35) 关于义和团研究的两个问题
- (36) 义和团是不反封建主义的
- (37) 义和团运动并未使帝国主义放弃瓜分中国的政策

中共党史总论

(1) 关于党史研究方法问题 北京高校党史研究生召开学术交流会, 探讨党史研究方法问题。近两年来, 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逐渐成为党史学界的一个话题。对此, 交流会上有两种意见。个别同志认为, 不应该把传统方法扔掉而去热衷于搞新方法, 应该做详细占有材料的工作。多数同志则感到, 党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对这一学科的建立和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但也显出研究领域狭窄、表述形式呆板、过多注释经典等弱点, 仅仅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党史已经不够了。一些同志谈到, 国外学术界运用跨学科的综合方法、比较研究法、计量分析法、口述研究法来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已不鲜见, 而苏、匈、南和西、意等国工人阶级政党史的研究, 也运用了一些新方法, 并颇有成效。因此, 一些同志提出, 在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中, 有必要运用系统方法、结构主义方法、计量分析法、模糊方法、耗散结构理论、随机理论、“灰色”理论、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有的同志还谈到党史研究应该真正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

关于传统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关系,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二者是融合的关系, 而不是排斥的关系, 二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应该统一起来、互为补充。有的同志谈到, 不能把新方法的运用与占有详细史料的工作对立起来, 任何新方法的运用都是建立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的。

关于建立历史哲学, 有的同志提出要建立起一整套历史哲学, 并提出历史哲学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本体感, 即说明历史科学的价值; 二是主体感, 即把人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 三是立体感, 即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纵向发展, 而且要研究历史发展中的各种横向关系; 四是总体感, 即把历史作为一个系统研究; 五是实体感, 即研究历史对现实的影响, 看到历史对今天的“有用性”。

另外, 有的同志提出在党史研究中既要“求真”又要“求善”。“求真”即在研究中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求善”即在表述上考虑社会效果。

交流会上, 有的同志用系统论评价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还有同志用随机理论分析了1959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的原因。

过去, 党史学界极少讨论研究方法问题, 交流会讨论这一问题确实有很大意义。看来,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继承中国史学方法的良好传统, 吸收现代科学方法的长处, 已经是党史学界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研究和探索的问题。(摘自《党史通讯》1986年第9期边吉文)

(2) 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体系问题 北京高校党史研究生召开学术讨论会, 探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体系问题。关于中共党史科学的性质, 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 党史应该是一门历史科学, 而不应是一门政治科学, 否则, 党史就不成其为科

学。另一种意见认为，党史既不是纯粹的历史科学，又不是纯粹的政治科学，而是历史科学与政治科学交揉的学科。会议普遍否认党史是一门政治学科的观点。

关于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体系，与会同志普遍认为，目前的党史和革命史有较大缺陷，一是没有脱离“讲义体”的模式，各种版本的党史和革命史缺乏特色；二是内容范围狭窄，党史如此，革命史更是如此。目前出版的各种革命史都只是在党史讲义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历史背景、民主党派活动的材料，严格说来只能叫内容丰富的党史，而不是革命史。

中国革命史体系是学术界以往不讨论的问题，对此，会议着重进行了讨论。不少同志认为，革命史的研究应该“拓宽”和“拉长”。有同志具体提出要做到“拓宽”和“拉长”，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一是广义与狭义的关系，二是横向与纵向的关系，三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四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

关于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与会同志对中国革命史的下限取得一致意见，都认为应该断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对于上限，看法存在分歧。有的同志认为中国革命史应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戊戌变法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相反，太平天国运动不能看作是革命，它靠宗教推动农民斗争，只能使中国社会更加落后。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史应该从太平天国运动写起，因为这次农民革命与以往不一样，一是它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如《资政新篇》的颁布；二是它发生的时代条件不一样了，这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达起来，中国也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也有同志主张，中国革命史应从1840年写起。

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分期，会议没有作更多讨论，但也有同志提出具体意见，主张以直接的革命对象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并把中国革命史划分为四个（或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直接的敌人是清王朝；第二个时期从护法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直接的敌人是北洋军阀；第三个时期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革命的敌人是国民党新军阀（这个时期里有个特殊阶段即抗日战争阶段，也可单独划作第四个时期）；第四个时期（或者叫第五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革命的敌人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摘自《党史通讯》1985年第6期边吉文）

（3）中国革命史上下限新说（李新认为，革命，严格地讲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原有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的除旧布新；二是这种社会制度的更替必须是通过暴力而不是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实现的。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虽然非常悠久，但从古至今却只发生过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场延续四十多年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前此中国的历史上虽爆发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但因为它们没有带来新的社会制度，所以不能称之为革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3年—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不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用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手段完成的，尽管它在我国历史上极具伟大意义，但亦只能被称其为改造—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新的中国革命史体系的上限始自1905年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同盟会的成

立，下限终至1949年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中又分为旧、新民主革命曾有交错的两大阶段，而每个阶段又适当地分别了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摘自李新主编《中国革命史丛书》序言）

（4）怎样看待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 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怎么看？建国以后，我们至少在建设中吃过照搬民主革命经验的亏，虽然不是全部照搬，但有些错误确是和照搬老经验有关。最近有个同志对我说，我们现在不能采取搞运动的形式了，但在某种情况下，有些同志有点痒痒，认为还是可以用运动搞一下。我们必须从理论上说清楚为什么在现在的条件下不能搞运动，如果说不清楚，就难免再犯这种错误。他说的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说现在不能搞运动，往往是从经验上来说的。许多年里搞运动都搞得不好，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等等为什么搞运动的办法不好，我们还没有讲出充分的道理来。那么，你从经验出发说搞运动不好，他也可以从经验出发说搞运动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民主革命中不是搞了许多运动吗？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土改运动等等。但民主革命时期那样用几个比较简单的斗争口号去发动群众的经验，看来是不能照搬的。当然，民主革命时期有些基本经验应该吸收，比如党同人民群众结成亲密的关系，从思想上建党等等，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是最根本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搞运动，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在运动中也容易出偏差。在那时党号召搞什么运动，同党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建设时期的情况不同。象五卅反帝运动，那是真正符合群众要求的，即使那样，也不可能把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只不过把相当一部分先进分子动员起来，带动一些中间的。到了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时候就不同了。如果党号召搞一个运动，那就谁都会跟着干。不论是不是群众真正要求干和可能干的，都会跟着干。所以民主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情况不同，照搬这些经验是不行的。在写过去的革命经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党是怎样取得这些经验的，哪些是应该继续接受的，哪些是不应该继续接受的。如果把不该接受的经验过于突出地写出来，那可能是不妥当的。

最近有些同志还说到这样一层意思，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都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也要看到，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由历史发展造成的这一情况，本来应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弥补，但相当长时期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的革命从农村起来，先有了军队和根据地，一旦夺取全国胜利，就有一大批现成的多少有点经验的干部，立刻接收大城市，也有了一套政策，这和俄国革命不同。过去我们在谈中国革命胜利中这方面的优势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在这种优势中又包含着一种弱点。现在在写党史时就要注意这样的问题。（摘自《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胡绳文）

（5）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甘肃《社会科学》今年第3期刊登张嘉选的文章指出，党史研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可概括为下列六个方面：（一）研究内容集中而领域偏窄。（二）从已发表和出版的论著看，多是资料辑录而少于具体考索，重叙述、介绍而轻研究探讨，致使研究内容有广度而无深度。（三）概念性的条条偏多，具体的历史事实、具体人物活动以及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状况的研究偏少。（四）我党自

身的内部研究多，党外的研究少；党内正面领袖人物的传记、评价、研究多，党内反面人物的研究少，有些研究也不尽客观、系统、全面。（五）忽视了将中共党史与同我党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党派的历史一同研究。（六）相比较而言，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多，对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研究较少，其研究成果所见寥寥。（摘自《新华文摘》1986年第10期）

（6）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问题 北京高校党史研究生召开学术交流会。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该成为中共党史研究重点，但是党史学界没有完全转到这方面来。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转过来，党史研究就没有生命力。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体系，一些同志认为这个问题与中国革命史体系问题一样，也需要研究和探讨。不少同志谈到，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知识结构应该是个综合体，包括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知识，比起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难度大了，要求高了，各学科交叉了。但是目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体系的知识结构还跟不上要求，尤其是缺乏经济理论，整个研究水平的层次较低。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方法，有的同志认为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因果联系法，需要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诸方面研究考察这个时期的党史。个别同志认为因果律的线性分析法，今天已经遇到随机理论的挑战，随机理论强调偶然因素的作用，某一个偶然因素能导致历史方向的新选择。更多的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因果分析法不是低层次的方法，不能简单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关于在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落后国家应该经历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巩固新民主主义经济之后，再搞社会主义。有的同志同意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认为这也许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另一种意见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再搞。会上，有的同时对苏联早期农业社会主义化的几次战略转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作了分析。（摘自《党史通讯》1986年第6期边吉文）

（7）中共组织史研究的现状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以下简称组织史）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和研究，最早是从中央档案馆裴桐开始的。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党的组织历史》课并编写了讲课提纲。提纲的下限截止到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中断了。

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央档案馆同志整理的组织史资料。与此同时，一九八一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开设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课程，在讲稿基础上编写成教材（人民大学已印出上册）。一九八三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一书。一九八五年三月，有关领导同志要求进一步注意全面认真地整理各种史料。此后，中央几个有关部门，将组织史资料的征集、汇集工作广泛开展起来；许多省还召开了全省组织史资料编写工作会议。

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为党建研究生开设了组织史课程，编写了十

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教学大纲》、三十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选辑）》等教学用书，概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多年组织建设的历史。除中央党校外，有的省、市党校也陆续为研究生班开设了这一课程。（摘自《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马俊玲文）

（8）中共组织史的定义与研究对象 关于组织史的定义与研究对象问题，目前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史是“研究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以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组织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2）研究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生活的历史变化，特别是对民主集中制作历史的考察；（3）研究党的历史上组织机构设置和党的各级领导人员的历史变动；（4）研究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状况；（5）研究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整党整风等问题；（6）研究组织路线的形成、发展，组织路线与政治路线的相互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组织史“研究党的组织制度和自党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关及人员配备发展演变的历史”。它主要以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内容包括：（1）研究党的各种组织制度的发展历史；（2）研究党的组织整顿和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4）研究党在军队、政权及民众团体中的组织工作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党的组织史应是党的建设史，研究党的成立及其性质，党的建设的曲折历程及其基本的经验教训，对党的建设的规律，进行历史的考察。只研究党的组织建设，是总结不出建设党的总体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的建设史，应对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的团结问题和党内斗争问题，党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等等，进行史的探讨。（摘自《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马俊玲文）

（9）组织史与党史、党建学科的关系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看法：

1、组织史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组织史虽然与党史、党建有交叉和联系，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特殊的研究领域。从与党史这门学科的关系上看，党史以研究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路线发展的历史为主。它一般不着重研究党的组织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即使有时涉及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某些问题，其目的也在于说明党是如何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及党是如何成熟起来的。而组织史则专门研究党的组织工作发展的具体问题，它的目的是说明党的组织建设的规律，说明党的组织工作是如何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

从与党的建设这门学科的关系上说，党的建设研究党的各个方面的理论原则，它也研究党的建设的实践活动，也讨论组织问题，但重点在于说明各种理论原则是怎样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组织史则不同，它研究党的组织建设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再现党的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所以组织史这门学科是党史、党建无法代替的。

2、组织史是党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中已经包括了组织问题在内的党的建设问题。当然由于党史教学对象的层次不同，对于党史专业以外的大学生和党校、干部学校的学员，一般比较注重讲述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路线发展的历史，这也构成了以往党史教材的特点。但是这对于党史的全面研究，对于党史专业的学生来说，还是很不够的。因此，开展组织史的研究，为党史专业的学生开设组织史课程，是十分必要的。但由此认为组织史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是欠妥当的。

3、组织史是党的建设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党的建设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的科学，是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包含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理论原则和活动规律。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也包括在其中了。如果把组织建设方面的内容抽出来，一是造成内容上的重复，如果由此类推会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都一一抽出来，党的建设学科就成了空架子。所以组织史不能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存在，是从属于党的建设学科的。（摘自《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马俊玲文）

（10）对党史教学中一种常用提法的商榷 在不少党史教材和文章中，常把抗战胜利后我党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策略方针的具体内容表述为：一方面准备自卫战争，一方面争取和平民主。这种提法不够准确，容易引起误解，也混淆了革命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手法的区别。

在抗战胜利以后新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即根本指导原则就是争取独立、和平与民主。这个时期我们党针对蒋介石采取的军事“剿共”与和平欺骗手段而确定的策略方针，就是以武装自卫与和平谈判的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方针。周恩来于1946年底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的报告中对我党策略方针提出的根据及其与实现战略目标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说明。他除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即战略方针）就是“七大”方针，就是政协路线，就是争取独立、和平与民主外，同时还明确指出，革命的两手，一手武装斗争，一手和平谈判，都是为着争取同一战略目标：独立、和平、民主。

如果把我党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策略方针的具体内容表述为“一方面准备自卫战争，一方面争取和平民主”，人们会问：这后一方面既然是“争取和平民主”，那么前一方面，即“准备自卫战争”，又是争取什么呢？难道我们的自卫战争不也是争取人们渴望的和平民主吗？其实，对这一点，毛泽东早有说明。他在《关于重庆谈判》中针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尖锐指出：“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既然革命的两手都是为了同一战略目标：争取和平民主，为什么又要把“争取和平民主”当作一种策略手段同另一手“准备自卫战争”相提并论呢？

造成上述不恰当表述的原因在于混淆了同一范围内战略与策略、目的与手法的区别。我们知道，按各种大小不同的范围来说，战略与策略、目的与手法的区分是相对

的。在一定范围内是战略任务，在另一范围内可以是手段，反之亦然。但在同一范围内，战略与策略、目的与手段的区别又是不能混淆的。因此，在论及革命的两手策略的具体内容时，应采取周恩来的表述：一手武装斗争，一手和平谈判。（摘自《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3期，刘晓武文）

（11）编写党史工具书应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出版的各类党史辞典、大事记、年表、名词解释等工具书中，在提到中国共产党、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常以“我党”、“我军”简称。这些书籍中有不少是供党内外以至国内外读者、研究者阅读使用的。这种简称，一般是从党内教学中沿用下来的，但在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书籍中，仍沿用这类称谓则不妥。

撰写历史类丛书，应以史实为依据，客观准确地记叙历史事件，而辞书则更应具有严肃性和准确性。使用“我党”、“我军”、“我……”等称谓，主要有以下一些不当：

第一，不能准确表达词意。将来的人们或对我们现状不甚了解的人们，不知道编著及出版者与多年前某军的关系，因而搞不清编著者的“我”的本意所指。

第二，“我军”等词在历史上及使用范围上具有不确定性。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我军”有着不同的外延。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可指“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但相对于日军而言又可指整个中国抗日军队。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一书中《百团大战》一条写道：“这次战役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这里的“我军”，从历史实际看应指“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从当时的敌我概念上看，又会使人理解为整个中国军队。在使用范围上，“我军”、“我根据地”等词，既可指整体，也可指局部，不如直称“解放军”、“西北解放军”等更明了准确。

第三，使用“我……”这样的称谓，容易使海外学者和后人产生误解，以为编著者是站在矛盾双方的一方评述历史事件，带有个人的成见，从而影响辞书的权威性。

我们认为，今后编著各类党史工具书，凡内部发行、为配合党内教学专供干部群众学习阅读的，仍可沿用这类称谓。而由学术出版单位编著、面向国内外各阶层人士公开出版发行的，应使用“中共”、“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等正式名称，从而作到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维护党史辞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此外，在各类党史工具书中“蒋党中央”、“蒋军”、“敌……”、“中央”、“军委”、“北方局”等等习惯称谓，也应改为“国民党中央”、“国民党军”、“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北方局”等等规范化名称。

中共党史是一门严密、独立的学科，有关它的学术著作应有别于一般党内教材，从而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尤其是工具书，它的用词必须严格、准确、规范化，切忌使用习惯用语。近年来，我国中共党史学界在史料征集、史实考证、问题研究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一些著作及工具书的编写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应该引起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的注意。（摘自《党史通讯》1986年第四期吴彤文）

（12）港台与国外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

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发生重大变革,各种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国中共党史学者受其影响,思想表现异常活跃,不仅力图在内容、角度、资料运用等方面标新立异,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刻意求新。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1、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张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总体历史”展开全面的综合研究,于是形成了历史人口学、地缘政治学、历史民族学、历史心理学等很多新兴学科,这就大大扩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派伊教授所著《中国政治的动态》一书,就是采用了社会科学和地域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

2、数量分析方法。六十年代以来,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普及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很多学者便开始将其引进历史研究中,从而创造出各种运用统计学和数学原理方法来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便从历史的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性上去建立可靠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有些美国学者曾就中共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人口政策等进行数量分析,从而做出了较为可靠的公正结论。美国哈佛大学沃格尔教授所写的《共产主义者治理下的广州:一九四九——一九六八》一书,就运用了大量数据来阐明解放后广东省的变化,并试图以此来概括地展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貌及其规律。联邦德国威廉·福克斯所著《明天的强国》一书,对中国的人口增长、能源消费、钢铁生产等多方面的数据进行数学计算,推论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必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和苏联。

3、比较研究方面。这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兴起于法国,很快便风行于世界各国。比较研究扩大了传统史学较为狭隘的视野,冲破了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从而可以更容易地概括出各国历史发展的共有规律性,同时也能把造成各国特色的因素分离出来。因此,比较研究不仅是国际史学界采用最多的一种新方法,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独立的学科,如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等。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很多,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三种季刊便经常刊载这方面的文章。

4、口述研究方法。这是六十年代首先在美国活跃起来的史学研究新方法。它不同于口述历史的传统方式,即不仅是收集和传播史料的方法,同时又是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在历史文字材料较为缺少的中国劳工史、华侨史、中国社团史等方面,这种方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摘自《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郭亮文)

(13) **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国际一体化趋势** 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台港与外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由于人员少和资金不足,基本是由各国、各地区的少数机构和个人独立进行,相互间联系很少。当时虽也有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等少数国际学术组织,但其规模 and 影响都比较小,而且中共党史的内容也只占会议内容的很小一部分。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国中国学的迅速发展,各国各地区的学术团体及个人的学术交流与协作日益增强,使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国际一体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性学术会议增多及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各国、各地区在中共党史研究

的国际交流中大致形成了四个学术活动区，一是美国为中心的南北美洲；二是以英、法、联邦德国为主的西欧各国；三是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各国；四是以日本、台湾为主的亚洲地区。实际上，有的学术机构已突破了上述学术区的地理界限和政治界限。如欧洲研究中国问题代表大会，其成员已由西欧诸国扩大到包括东欧诸国的全欧会议；由国际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大会所举办的国际会议每届都有数十个国家的数千名代表参加。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术机构不仅在此类大型国际会议上散布污蔑中共党史的言论，而且在台湾也不断举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如一九八一年举办了有台港及各国二百二十四位学者参加的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会后出版了六大册论文集；一九八五年又举办了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五十名外国与香港的学者参加。在这些会议的论文和发言中，充斥着对中共党史的曲解。

2、各国、各地区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巨额资金支持本国和国外对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的研究。如被称为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主要动力”——福特基金会，曾拿出数百万美元支持美国国内及英、法、联邦德国、日本和台港对中国的研究。这就促进了跨国学术组织的建立和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如美国的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协会，会址设在菲律宾，五名执委来自五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3、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和扩大。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都是向全社会和全世界开放，并且在各国图书馆之间还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在一九七五年就同国内和加拿大的各图书馆建立了调阅中文图书的协作关系。该图书馆还同台湾的中央图书馆订立了交换馆藏中文资料复制品协定，同时又在香港和东京设立了搜集有关中国资料的专门机构。再如香港友联研究所共整理了二千五百盘大陆资料的缩微胶卷，这些资料都毫无保留地向世界开放，在美国、欧洲、亚洲一些研究中国的重要机构里都可查到该所的复制品。

4、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合作主要表现为共同研究和合写论文。如荷兰美国跨国研究所和政策学研究所跨国计划的各国学者，便是共同研究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学者之间的交流主要表现在出国讲学、留学和工作上。如加拿大亚洲研究会在一九七八年时已有来自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名外国会员，其中也有中国复旦大学和台湾的学者。英国现代中国研究所负责人是美国学者施拉姆，《中国季刊》的编委和撰稿人中的大多数也不是英国人，而英籍学者韩素音又长期在美国和法国居住和工作。现在各国的大学普遍都设有外国客座教授，如美国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经常邀请各国专家任客座教授，并为他们安排办公室和助手。

台港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一体化趋势表明了社会科学的日趋进步，它使个人的自由研究和集体协作结合起来，从而比“单干”发挥出更大的优势，促进了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摘自1986年第5期《党史研究》郭亮文）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4) 党的创立阶段应否独立划为一个时期 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9页）；然而“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2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全部党史发展的链条中占何种地位，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目前有三种不同的提法：第一种将创立阶段作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部分，在讲义中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中共党史的开端。第二种将党的创立与“一战”并列，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种则是将党的创立独立划为一个时期，作为党史的第一阶段。我是同意第三种意见的。

首先，从党的一些早期领导同志的论述看，虽然在具体时间和提法上有所不同，但大都将党的创立作为党史上的一个独立阶段。如：瞿秋白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将1920年5月至1922年6月，划为“中国共产党的形成”时期，单独作为一讲；蔡和森同志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将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5年五卅运动前，定为“党的产生时期”；李立三同志在《党史报告》中提出：“党从第一次大会到二七运动是一个段落……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时期”；王若飞同志在《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准备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也认为：“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

其次，划分党史的不同时期，应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和工作重心的不同为依据。如果将党的创立与第一次大革命合为一个时期，那么在这一时期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重心应当前后一致，但是实际并非如此。

从党的基本任务看，党创立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战争。从党的工作重心看，创立阶段党的工作中心是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工会组织，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则是“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

从党的策略方针看，创立阶段党缺少明确的策略方针，只是领导工人阶级单枪匹马地进行斗争，采取了“独立的进取的政策”。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前一阶段工人运动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工人阶级独立的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必要有各阶级的援助”，因而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是与大革命时期内容不同的独立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是创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定出党的纲领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最初尝试阶段，在党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摘自《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顾小平文）

（15）关于党创立时期的上限 关于上限时间的确定，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创立时期的起点；另一种是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起点。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并无根本的原则分歧，只是对于中共党史开端的理解不同。持第二种意见的同志是从中共党史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发展历史这一概念出发，将党正式诞生的时间作为党的历史的起点，虽然在论述党的创立过程时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但在时间划分上却局限于党的成立之时。这一认识不免显得机械死板，无法反映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完整过程和历史特点。第一种意见则是从建党的实际过程出发，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包括建党的酝酿准备，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全党统一组织的建立等不同阶段，从而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并正确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历史特点。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可取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二者结合之初，即党创立过程之始。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是五四运动。一方面，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走上历史政治舞台，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斗争的发展，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而且需要建立政党作为本阶级的先锋队和核心力量，这就提出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从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革命的知识分子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逐步完成了自身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建党成为可能。

建党的实际过程也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开始的。从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并开始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直到1921年7月23日，在各地做了充分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中央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组织正式建立。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自五四运动开始，就已孕育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母体之中，开始了其最初的生命，一旦时机成熟便应运而生了。（摘自《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顾小平文）

（16）关于党创立时期的下限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确定党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之间的分期标志，对此目前存在的分歧较大。

第一种意见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全部完成，党的创建时期就此结束，中国共产党又“踏上了新的战斗征途”（见《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19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第二种意见是：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使党认识到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从此，党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这标志着党由创立时期转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中央党校出版社）。

第三种意见认为：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正式确立了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提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这标志着党的创立时期的结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见《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四种意见认为：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表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标志着党的创立时期的结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此系传统提法）。

我认为第三种意见是可取的，即以中共三大的召开为分期标志。理由是：

第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变，是区别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建党初期，党的工作中心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页）。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明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必须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中也指出：“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切实研究这种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围绕这一中心，党在创立时期的主要实际工作就是领导和发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先后共组织了六百多次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三十多万，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党在此期间所以单纯注重工人运动，是因为许多同志“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只应做无产阶级事情”（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页），“主张中国可以做直接无产阶级革命，以为不要经过民主革命的阶段”（李立三：《党史报告》，同上，第212页）。虽然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如何实现这一纲领，还有待于进行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

二七罢工时，我党许多同志“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二七罢工失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在失败的教训面前，党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作中心。然而这一转变并不是一次突变，而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讨论，特别